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朱东润著

古典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綱

朱东潤著

古典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上海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綱

朱东润著

*
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副號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書号 170

开本 860×1156 纸 1/32 印张 11 1/8 字数 256,000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9,000 定价(?) 1.20 元

自序

一九三一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間，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講义初稿。一九三二年秋間，重加訂補，一九三三年完成第二稿。一九三六年再行刪正，經過一年的時間，完成第三稿。一九三七年的秋天开始排印。这时对外的抗战爆发了，烽火照遍了全国，一切的機構發生障礙，第三稿印成一半，只得擱下，其余的原稿保存在汉口。一九三八年春間，武汉大学西迁。就在这一年，放弃武汉，整个的战局起了变化。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講义第三稿也只臘了上半部。

在这几年的中間，自己曾經几次想把这部書重行写定，但是手邊的書沒有了，手鈔的筆記也沒有了，連帶想把第二稿的下半部重行刪正，也不可得。承朋友們的好意，要我把这部書出版，我總是迟疑。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後，全部付印，因此又遷延了若干時日。事實終于顯然了，我的大部的書籍和手寫的稿件都沒有收回的希望。所以最後決定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合，略加校定，這便是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綱的前身。在這裡，一切的形式和內容，无疑的都流露了講義的氣息。

講義便有講義的特点。因为授課的時間受到限制，所以每次的講授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因为講授的當中不能照本宣

讀，所以講授的材料不能完全擱入講義。因为在言論中要引起必要的注意，同时因为引証的語句，不能在口头完全傳达；所以講義中間勢必填塞了許多的引証，而重要的結論有时不尽写出。因为書名人名的目录，无论如何的重要，都容易引起听众的厌倦；所以除了最关紧要的批評家和著作以外，一概不輕闡入。这些都是講義的特点，姑不必問其是优点或是劣点。

然而講義确有講義的劣点。因为要避免掉書袋的批評，所以引書不一定注明篇卷。因为校对的疏忽，所以字句的誤植，标点的錯排，有时多至惊人。这里的責任，有些属于我自己，也有些不屬於我。在出版的时候，当然應該全部改定，責无旁貸。在平时，本来应当如此的，然而現在是战时。战争增加了无限的光荣，然而也发生了不少的困难。战时的書肆，貧乏到怎样的程度，战时的圖書館，凌乱到怎样的程度，在太平了以后，大家也許不易想象，但是身經战时的我們，正在抗战的當中，必然会加以体認。我相信寬恕的讀者对于这本书的疏忽，也許会加以格外的优容。我也希望还有書籍湊手，重新写定的一日。然而我对于这本书的疏忽，只有負責，只有引咎。

在我的初稿写成以前，陳鐘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評史已經出版了；在初稿完成以后，郭紹虞先生的和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評史也陸續出版。此外还看到許多关于中国文学批評的著作。諸位先生治学的热忱和撰述的价值，深刻地引起我的欽服。但是我对于我这本书的責任，一切由我自己负担。在和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相同的地方，我不會作有心的抄襲；在和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會作故意的違反。討論一切事物的时候，有一般的局勢，有各殊的立場。因为局势相同，所以結論类似，同时也因为立場不一，所以对于万事万物看出种

种不同的形态。这本书的內容，和諸位先生的著作有异同的地方，只是事理的当然，原不足怪。我需要特別指出的，就是不同的地方只是看法的不同，不敢抱自是的見地。

第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这本书的章目里只見到无数的个人，沒有指出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或者这是怎样的一个宗派。写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的人，忘去了作者的时代或宗派，是一种不能辩护的疏忽。在全書中，我曾經指出刘勰、鍾嶸所处的时代，我也會指出对于当时的潮流刘勰如何地順應，鍾嶸如何地反抗。我曾經指出元祐以后江西派几度的革新，我也會指出反江西派的批评者如何地奋斗。至于明代秦汉派和唐宋派的递兴，清代神韵、性灵兩宗的迭起，桐城、阳湖兩派的相关，我相信我也會指出。但是我不曾对于每个时代加以特殊的标帜，而对于每个批评家，縱使大众指为某宗某派，甚至自己也承認是某宗某派，我很难得在姓名之上加以特別的名称。一切都是出于有意。我認為偉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屬於任何的时代和宗派。他們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們也超越时代。这是一个矛盾，然而人生本来是矛盾的。刘勰承受宋齐以来的潮流，然而刘勰不满意宋齐以来的現實。严羽承受南宋以来的潮流，然而严羽不满意南宋以来的現實。假如我們承認刘勰、严羽的超越时代只是一种特例罢，但是鍾嶸較之刘勰更加超越，方回較之严羽也何尝不超越？我們怎样解釋呢？就宗派而論，偉大的批评家也和偉大的政治家一样，他們的抱負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的指导。宗派会有固定的規律，甚至也会有因襲的恩怨，然而偉大的人生常会打破这些不必要的規律和不可理喻的恩怨。韓愈和李翹不同，黃庭堅、陈无己和韓駒、呂本中不同，李攀龍和王世貞不同，方苞、刘大櫆和姚鼐、曾国藩不同，我們又怎样解釋呢？也許有人指出

他們之間大同小異，所以不妨承認宗派的存在。倘使他們的中間只是大同小異，原不妨這樣說；但是誰能保證他們的中間不會是小同大異呢？因此，在這些情形之下，就時代或宗派立論，有時固然增加了不少的便利，有時也不免平添了若干的困難。所以，我決然放棄時代和宗派的標題，在章目里只見到無數的個人。這是一個嘗試，也許可以得到讀者的容許。

第二個不同的地方，是對於每個批評家，常把論詩論文的主張放在一篇以內而不給以分別的敘述。批評家論詩論文，有時採取不同的立場：韓愈是一個例，袁枚自稱論文嚴而論詩寬，更是顯然的一個例。所以分門別類的敘述，確實有一種便利；但是這裡，和上面一樣，也有相當的困難。蘇軾論詩論文論詞，都有他的主張，我們不便把整個的蘇軾分隸於三個不同的篇幅。在一部比較詳密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里，困難還要增加。劉熙載的艺概，論詩，論文，論賦，論詞曲，論經艺，我們更不便把整個的劉熙載分隸於五六十個不同的篇幅。中國文學批評史究竟不是文論史，詩論史，詞曲論史的聯合的組織，所以我決意放棄分門別類的敘述；除了僅有的例外，在這本書里所看到的，常常是整個的批評家，而不是每個批評家的多方面的組合。

第三個不同的地方，是這本書的敘述特別注重近代的批評家。中國是一個富于古代歷史的國家，整個的知識界瀰漫了“信而好古”的氣氛。五四運動以前，一般的知識分子固然是好古；五四運動以後，除了打開窗戶，吸收一些外來的空氣以外，仍然是好古。大學課程里，文學史的講授，只到唐宋為止；專書的研討，看不到宋代以後的作品——並不是罕見的實例。因此即是討論到中國文學批評，一般人只能想起劉勰文心雕龍和鍾嶸詩品，最多只到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十一世紀以後的著作，几乎逸

出文学界的視野，这不能不算是駭人听聞！有人會說文学批評的原理，��勰、鍾嶸已經說盡，其余只贅一些枝叶，用不着过分注意。在言論自由的社会里，每人有发表意見的自由，这当然是一种意見。但是我的意見，是应当根据远略近詳的原則，对于近代的批評家加以詳密的叙述。也許这里講得太多一点，但是我們对于一千年以来的历史既然无法加以“革除”，我們的生活同样地也无法超越近代的阶段，遙接一千以上的古人，那么即使多知道一点近代文学批評的趋势，似乎也不算精力的浪費。何況縱使這本書“远略近詳”，其他主張“近詳远略”的著作原自不乏。一切的事物，相反亦可相成，广博的讀者當然可以得到必要的补偿。

這本書的出版虽迟，但是看見講稿的人已經不少。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來的批評，我是一概地接受，一概地感激。除了几种极端的評論以外，这里可以提出一点。有人說這本書虽然是“史”，但是还有些“文”的意味。有人說這是“文学批評之批評”。假如我的猜測不錯，他們的意見也同樣地認為這本書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而有时不免加以主觀的判断。这一点我当然承認，但是我願意聲明，一切史的叙述里，縱使我們尽力排除主觀的判断，事实上还是不能排除淨尽。“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什么是“至”？中庸說過，君子之道，“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我們的目标，不妨完全是史实的叙述，然而事实上不能办到，这是一点。还有，既然是史，便有史觀的問題。作史的人总有他自己的立場，他的立場所看到的，永远是事态的片面，而不是事态的全面。固然，我們也說要从許多不同的角度，觀察事态，但是一个事态的許多片面的总和，仍旧不是事态的全面。这是又一点。还有，历史的記載当然是

史，文学批评史也是史，但是和历史的史究竟还有些不同的。在已往的许多著作里，什么是文学批评，什么不是文学批评呢？在取材的时候，不能不有一个辨别，辨别便是判断，便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在叙述几个批评家的时候，不能不指出流变，甚至也不能不加以比较，这也是判断，更不是史实的叙述。文学批评史的本質，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这是第三点。事态上无可避免的现实，只有请求读者的原谅。

这本简陋的著述在国难中付印，更减少了请求订正和自行修改的机会。叙述的错误和判断的不正确，都在所不免，一切请求读者不吝指示，俾得订正。

在本书的创始和出版中，得到许多朋友的指导，我都十分感激。对于协同搜集材料的任慈忱先生，提议付印的马文珍先生，和赞助出版的叶圣陶先生，尤其应当借此机会，表示深切的感谢。

一九四三年二月，重庆，柏溪

目 次

自 序

第 一	緒言	1
第 二	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諸家	3
第 三	詩三百五篇及詩序	9
第 四	西漢之文學批評	13
第 五	東漢之文學批評	16
第 六	建安時代之文學批評	22
第 七	陸机陸雲	25
第 八	皇甫謐左思摯虞附李充	29
第 九	葛洪	32
第 十	范曄蕭子顯附裴子野	36
第 十一	沈約	39
第 十二	劉勰	44
第 十三	鍾嶸	54
第 十四	蕭統蕭綱蕭繹	61
第 十五	顏之推	66
第 十六	隋代之文學批評及“文中子”	70
第 十七	唐初史家之文學批評	73
第十八	劉知幾	77

第十九	初唐及盛唐时代之詩論	81
第二十	白居易元稹	85
第二十一	韓愈	88
第二十二	柳冕柳宗元李翱皇甫湜李德裕	92
第二十三	司空图附唐人論詩雜著	98
第二十四	歐陽修曾巩	102
第二十五	王安石蔡絛葉夢得	107
第二十六	蘇軾蘇轍張耒	112
第二十七	黃庭堅	117
第二十八	陳師道范溫	123
第二十九	呂本中韓駢	128
第三十	張戒	133
第三十一	楊万里姜夔陸游	138
第三十二	葉适	144
第三十三	朱熹附道学家文論	147
第三十四	自詩本義至詩集傳	154
第三十五	嚴羽	157
第三十六	劉克莊	162
第三十七	晁公遡李清照黃昇	166
第三十八	沈义父張炎	170
第三十九	方回	174
第四十	元好問	179
第四十一	貫雲石周德清喬吉	182
第四十二	高棅	186
第四十三	李夢陽何景明徐祯卿附李东阳	191
第四十四	楊慎	196

第四十五	謝榛王世貞	201
第四十六	唐順之茅坤	207
第四十七	歸有光及“弇州晚年定論”	212
第四十八	徐渭臧懋循沈德符	216
第四十九	呂天成王驥德	219
第五十	袁宏道	224
第五十一	鍾惺譚元春	228
第五十二	錢謙益	233
第五十三	馮班	237
第五十四	陳子龍吳偉業	241
第五十五	黃宗羲	246
第五十六	王夫之顧炎武	251
第五十七	侯方域魏禧	255
第五十八	毛奇齡朱彝尊	260
第五十九	王士禛	264
第六十	吳乔趙執信	270
第六十一	葉燮	274
第六十二	清初論詞諸家	279
第六十三	金人瑞	285
第六十四	李漁	289
第六十五	方苞劉大櫆	293
第六十六	姚鼐劉开	297
第六十七	紀昀	301
第六十八	沈德潛	304
第六十九	袁枚	308
第七十	趙翼	312

第七十一	章學誠.....	317
第七十二	阮元.....	320
第七十三	恽敬.....	324
第七十四	張惠言周濟.....	327
第七十五	曾國藩.....	331
第七十六	陳廷焯.....	335

後記

第一 緒 言

文学批評一語，古无定名。隋書經籍志于文章流別志論、翰林論、文心雕龍等諸書，皆附列总集之后，所謂解釋評論，总于此編者也。旧唐書因之。新唐書艺文志始立文史类，凡四家四部十八卷，其不著录者又若干。宋史因之，凡九十八部六百卷，然如艇齋詩話，苕溪漁隱叢話等，又別入小說类，則分部別居，蓋有未尽者。明史艺文志亦有文史类，凡四十八部二百六十卷，其錯入小說类者未見，蓋視宋史为加謹矣。四庫总目始別有詩文評类，然亦不能尽赅文学批評，如乐府指迷，詞苑叢談之附入詞曲类者是也。

凡一民族之文学，經過一发揚光大之时代者，其初往往有主持风会，发踪指使之人物，其終复恒有折衷群言，論列得失之論师，中間參伍錯綜，辨析疑难之作家，又不絕于途。凡此諸家之作，皆所謂文学批評也。得其著而讀之，一代文学之流变，了然于心目間矣。

文学批評与批評文学，二名并县，詰訓兩异。文学批評之义，略如前陈，批評文学則指其中之尤雅飭整齐者而言。只詞單句，不成片段者，固无论矣，即摭拾贅語，勉成完書者，亦非其倫。舉此以繩，自文心雕龍，鍾嶸詩品，史通，原詩，文史通義等諸書以外，可得而數者，盖无几矣。今茲所論，固不限此。

或者謂文學批評之盛衰，每視文學之升降為轉移，斯又不然。魏晉六朝之文學，以太康間為極盛，而劉鍾成書，翻在齊梁。唐人之詩，標新領異，恢廣疆土，包毓靈異，而唐人論詩，自司空圖詩品以外，未中肯綮。妙觀逸响之句，獨標奧義，詩眼响字之論，備言音律，此皆出自宋人，遠邁唐代。宋人之詞，千年獨擅，然宋人論詞，或造詩余之說，辭而辟之，翻在近日。至于東坡之空靈，碧山之沈鬱，推少游為詞心，辟劉蔣為外道，此論惟于後人得之。戏曲肇自金元，小說盛于明代，而評論戏曲，批判小說，則探幽鉤深，出色當行者，蓋犹有待。然則，謂文學批評之與文學同時升降者，誤矣。

然于此中有當知者，則對於某項文學之批評，其成熟之時，必在其對象已經完成以後。有違此例，必多乖舛。昔摯虞持論，謂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至于五言七言，但于俳諧倡樂用之。此言若令六朝以後聞之，寧不成為笑柄。英人高斯嘗言：“自今覘之，昔日之批評家建樹規律，執一繩墨，其病常在所不免，正規之批評中，常為此規律太嚴之病所乘，而創造的想象所成之作品，常以不合當代之規律而見斥，如勃萊克，基慈，乃至彌爾敦之詩是矣。”此言可以証也。

至于中國文學批評之分類，四庫總目詩文評類提要云：“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灑灑，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後為一書傳于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采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后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舉此五端以當文學批評，範圍較狹，而詩話詞話雜陳瑣事者，尤非文學批評之正軌。然前代文人評

論之作，每每散見，爬羅剔抉，始得其論點所在，正不可以詩文評之類盡之也。至若東坡之論蘇李贈答，晦庵之辨詩大小序，此則自為考訂一派，逸出文學批評之常軌，今茲所述，蓋从略焉。

今欲觀古人文學批評之所成就，要而論之，蓋有六端。自成一書，條理畢具，如劉勰鍾嵘之書，一也。发为篇章，散見本集，如韓愈論文論詩諸篇，二也。甄采諸家，定為選本，後人从此去取，窺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嶽英靈集，高仲武之中興間氣集，三也。亦有選家，間附評注，雖繁簡異趣，語或不一，而望表知里，情態畢具，如方回之瀛奎律髓，張惠言之詞選，四也。他若宗旨有在，而語不尽傳，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見于他人專書，如山谷之說，備見詩眼者為五；見于他人詩文，如四靈之論，見于水心集者，六也。此六端外，或有可舉，蓋不數數覩焉。

讀中國文學批評，尤有當注意者，昔人用語，往往參互，言者既異，人心亦變。同一言文也，或則以為先王之遺文，或則以為事出沈思，功歸翰藻之著作。同一言氣也，而曹丕之說，不同于蕭繹，韓愈之說，不同于柳冕。乃至論及具體名詞，亦復人各一說，如晚唐之稱，或則以為上包韓柳元白，或則以為專指開成而后。逐步換形，所指頓異，自非博綜于始終之變者，鮮不為所替亂，此則分析比較，疏通證明之功之所以貴也。

第二 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諸家

文學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凡一民族形成之時期，其哲人巨子之言論風采，往往影響于其民族精神，流風余韻，歷千百年。故于此時期中，能深求一代名哲之主張，于其民族文學之得失，思過半矣。此其人雖不必以文學批評家論，而其影響之大，往往

过一般之批评家远甚。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旧说以为虞舜之言，说诗者多称道之，所托虽古，实不足信。求古人之言论，要不出春秋以来，其时实为吾民族形成之时代。自周之兴，宗族勳旧，分布东方，及犬戎进逼，幽王失国，于是全民族东徙，复与东方固有之诸族混合，文化进展。今日吾人所读之古籍，诗书春秋，皆此时期以来之产物也。其时之思想家，与后代以最大之影响者，则有孔子。

孔子论文，皆指学问而言，与后世之言文学者不同。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其意可見。他如论语所记，皆可举証：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何晏集解引马融說：“马曰文者古之遗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邢昺疏：“文谓先王之遗文。”

子曰：从我于陈蔡间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先进 邢昺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

后人或据四科之序，文不在上，以証孔子重德行而輕文学之旨；以文行忠信之次論之，其說不可尽信。然論語宪問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述而亦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旨可見。大抵孔子言文，要在应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其言可証也。

論語論關雎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古人以为言其音律谐适，使人聞之中和且平，而不至于淫且伤焉。此論蓋为音律而发。至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云：“詩可